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

汪高鑫 著



商務印書館

北京师范大学

董仲舒与汉代历史 思想研究

汪高鑫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汪高鑫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9180-0

I. ①董… II. ①汪… III. ①董仲舒(前 179~前
104 年)—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3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44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

汪高鑫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180-0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¹/₄

定价:22.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杨共乐

副主任：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又有一批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导论·····	1
一、西汉前中期的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	1
二、董仲舒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地位·····	11
三、董仲舒的历史思想及其对汉代历史思潮的影响·····	16
四、关于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的研究现状·····	25

上编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 汉代“究天人之际”历史思想

绪言·····	33
第一章 “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历史决定论的 神学表述形式·····	38
一、“天人感应”论的理论渊源·····	38
二、“天人感应”论的基本内涵·····	46
三、“天人感应”论的精神实质·····	54
第二章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60
一、高扬人的价值·····	60
二、汲取今文经学“圣人感生”说·····	66
三、与董仲舒天人观念的异同·····	72
第三章 两汉之际神意史观的发展和神学批判思想的出现··	74

一、刘向对董仲舒“灾异”论的继承和发展	74
二、班固对董仲舒以来神意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90
三、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102
第四章 东汉末年的天人思潮	112
一、“二类”说:何休对“天人感应”论的总结	112
二、荀悦天人观的思想特点	127

中编 董仲舒的“三统”、“五德” 说与汉代“通古今之变”历史思想

绪言	145
第五章 “三统”、“五德”说:董仲舒的历史运次论	150
一、“三统”说:董仲舒的更化救弊论	150
二、“五德”说:董仲舒的王朝更替论	166
第六章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175
一、“通古今之变”的哲理基础与思想方法	175
二、汲取董仲舒的“三统”说	181
三、继承邹衍、董仲舒的“五德”说	188
第七章 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运次说	193
一、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	193
二、颠覆邹衍的“五德”相胜说	198
三、汲取董仲舒的“三统”说	204
第八章 何休的“三世”历史发展说	210
一、“三世”说的理论渊源	210
二、“衰乱—升平—太平”之“三世”说	213
三、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的“三统”说	218

下编 董仲舒的“大一统”说与汉代 “大一统”历史思想

绪言	227
第九章 “大一统”说:董仲舒的政治历史秩序论	230
一、“王一天一元”说:“大一统”形上论	230
二、“立王正始”的政治大一统思想	237
三、“王者爱及四夷”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242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主张	249
第十章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的史学特色与进步性	254
一、“大一统”思想的史学表现形式	254
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思想统一路径	265
三、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进步性	268
第十一章 班固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之异同	275
一、断汉为史: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颂扬	275
二、与董仲舒民族大一统思想之异同	282
第十二章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的“大一统”思想	287
一、“五始”说:“大一统”形上论	287
二、“尊天子”与“进夷狄”:“大一统”形下论	292
结语	304
主要参考文献	308

导 论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西汉武帝为巩固大一统政治局面,而致力于解决王国问题、匈奴之患和统一意识形态诸问题的时期。作为汉代“大一统”理论的构建者、一代经学宗师,董仲舒在天人关系、古今之变和大一统等问题上,都提出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有汉一代人们的历史思想。

一、西汉前中期的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

西汉前中期社会政治之显著特点,是西汉皇朝通过政治上解决王国问题以实现中央集权、经济上与民休息以养育国力、军事上发动反击匈奴战争以解除边患,从而完成了大一统政权的巩固。与大一统政治相适应,西汉皇朝在意识形态上也进行了抉择,由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皇朝统一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背景之下,汉代的学术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武帝为巩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推行思想大一统政策;而“独尊儒术”的结果,带来的则是尊孔

读经和经学的兴起。与此同时,随着司马迁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①为方法,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②为旨趣,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由此成就了史家的“一家之言”。经史之学的兴起,无疑是汉代学术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

汉朝大一统政治的巩固过程,开始于汉初,完成于汉武帝时期。刘邦建立汉朝后,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其中既有强大的匈奴构成的严重的国防危机,也有异姓王的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更有长期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相比较而言,致力于改变严峻的经济局势,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显得更为迫在眉睫。为此,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勿扰民、勿伤民,以养育民力;而主要手段则是采取各种轻徭薄赋的措施。由刘邦开创的这一政策,经过文帝、景帝的继续推行,终于使西汉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

在着手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刘邦也开始解决异姓王对刘姓政权构成的威胁,而他的基本做法则是大封同姓王、剪除异姓王。明陈仁锡在《史记考》中,对汉初异姓王与同姓王的力量消长情况有一个比照说明:高祖五年(前202年)时,是“异姓强而同姓未封也”;高祖六年(前203年)时,“异姓同姓,强弱略相当也”;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时,“则天下之势,同姓强,异姓决无而仅有”。然而,以这种同姓王取代异姓王的方式,并没有使刘汉政权的中央集权统治得到巩固。刘邦之后,随着同姓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同样构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成了对汉朝中央集权政治的严重威胁，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便是这种威胁的一个总爆发。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限制乃至铲除同姓王，便成为此时刘汉统治者必须要做出的历史选择。早在汉文帝时期，思想家贾谊就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汉景帝时，大臣晁错也提出了“削藩”的主张（“七国之乱”即是因此而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发动起来的），然而终文景之世，并没有取得具体的政治实效。汉武帝即位后，深深感到了解决王国问题的紧迫性。为此，他采取了不少具体的压制和打击诸侯王的措施，特别是后来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王国可以推“私恩”，将土地分给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弟，成为列侯，由皇帝制定侯国名号，地位与县相当，隶属于郡。其结果，王国的辖地不断缩小，长期以来存在的诸侯王强大难治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汉武帝为巩固大一统政治的军事举措，便是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西汉初年，由于国力虚弱，不得不与匈奴实行妥协的和亲政策，通过嫁公主于单于、岁奉贡献和开关市贸易等形式，换得边境相对的安宁局面。这种和亲政策推行几十年之久，固然为汉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争取了安定的环境，但是和亲政策是在汉朝国力虚弱的情况下推行的，其本身对汉朝而言是具有屈辱性的，加上匈奴贵族又常常背约犯边，因此，随着西汉国力的强盛，这种具有防御性质的和亲政策，必然会被军事征讨政策所代替。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汉皇朝取得了胜利。战争的失败，使得匈奴的国力遭到重创，加上自然灾荒，匈奴很快便陷入内战的旋涡。汉

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自请保塞,汉匈之间再度出现了和平相处的局面,双边由此“生人休息六十余年”^①。

在大一统政治得到巩固的同时,汉武帝为适应大一统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西汉初年,有鉴于秦皇朝因严刑酷法而导致国家迅速败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以稳定政策、休养生息和宽缓刑法为内容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经过六七十年黄老政治的推行,终于迎来了“民则人给家足”的“文景盛世”局面。然而,黄老思想毕竟是先秦道家的支流,具有浓厚的无为色彩。这种无为,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一种保守性,缺乏进取精神。这种少生是非、少动干戈的思想,对于发展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对于解决王国问题和匈奴之患,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而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汉皇朝的大一统政治就不能得到巩固。有鉴于此,汉武帝即位后,便再度对封建统治思想进行了调整。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确定为封建统治思想。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学说内蕴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之义,迎合了有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要求。汉武帝希望通过申明尊王和大一统之义,来解决王国问题,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通过申明攘夷之义,发动对匈奴的讨伐战争,以此来消除边患,巩固国防。同时,儒家的仁政主张与黄老道家的与民休息思想并不是相抵触的,而是相一致的。

关于汉武帝即位后,开始转变统治思想,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具体过程,《史记·儒林列传》作如是说:

^①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这段话告诉人们，汉武帝即位伊始，即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倡明儒学。人们开始重视研习儒家五经，五经博士受到士人推崇。窦太后去世后（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即拜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一方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另一方面则大量延揽文学儒生，公孙弘作为汉武帝时期治《春秋》的儒生、平民，得到超拔而位至三公。从此以后，儒学受到全社会文人学士的重视，研读经书蔚然成风，经学由此兴起。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制定与推行过程中，我们首先得关注两位人物，一个是公孙弘，一个是董仲舒，他们是西汉经学兴起过程中的两个标志性儒家学者。据《汉书》本传记载，公孙弘早在汉武帝即位之年（前140年）招贤良文学时，就以六十岁的年龄参加了对策，且以贤良征为博士。十年后的元光五年（前130年）再次对策，“天子擢弘为第一”。而据上述《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由此可知，公孙弘作为一位普通治《春秋》的儒家学者，凭借对策而受到重用，由布衣而位至三公，受封为侯，由此名闻天下。公孙弘的拜官受封，其实是汉武帝为天下士人树立的一

个儒者经师典范,其象征意义无疑要大于实际意义,它对汉代经学的兴起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董仲舒是汉武帝大一统政治的理论设计师。与公孙弘一样,也是以治《春秋》起家,以对策而闻达。所不同的是,“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①董仲舒虽然在西汉前期治《春秋》最为有名,仕途却远不如公孙弘。《汉书》本传详细载记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中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②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这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标志性事件,董仲舒的儒学地位也由此而确定。

其次是关于五经博士的设置问题。“博士”的本意是指博学通达之士,所谓“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③作为一种学官制度,博士之名,战国后期已有之。秦朝博士多达七十余人,《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而根据马非百《秦集史·博士表》的考证,秦朝博士官并不专于一家,其职责是通古今、辨然否和典政教。到了汉初,汉承秦制,在学官制度上的体现,便是沿袭秦朝博士官制度,而且博士人数也大体与秦相仿。如《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引东汉卫宏《汉旧仪》说:“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汉初博士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② 关于董仲舒对策时间,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提出建元元年(前140年)说、南宋洪迈《容斋续笔》提出元光元年(前134年)说之后,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迄今为止,这两种说法都有不少学者认可,莫衷一是。其实二说都有未解之处,本文姑从司马光建元元年说。

③ 《汉书》卷十《成帝纪》。

官的选召也是不主一家的，刘歆曾说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①由此可见，从秦朝到汉初，博士官都是兼治经书与子书的。其中治经博士，文帝时“始置一经博士”^②，即《诗》博士，齐申公、燕韩婴皆以治《诗》被立为博士；汉景帝时有“三经博士”，像治《齐诗》的轅固生、治《尚书》的张生、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皆为博士。汉武帝“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前 136 年）初正式开始“置五经博士”^③，“五经”即为《诗》、《书》、《易》、《礼》和《春秋》。五经学博士的设置，意味着儒家经学开始逐渐垄断官学。从此以后，研习儒经成为士人晋身的重要阶梯，尊孔读经因此蔚然成风，经学也由此而兴起。

再次是汉武帝是否真正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问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对策（《天人三策》）中提出并得到汉武帝采纳的，虽然学术界对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大体有建元元年（前 140 年）说和元光元年（前 134 年）说两种（见前注文），不过两个时间相差也就只有六年。问题的关键是，汉武帝是否在在位时期真正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此，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对策”后，官学中罢黜了诸子百家博士官，确立了五经在官学中的垄断地位^④；有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即是何时取消诸子传记博士的建置的问题，然而汉

①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八《翟酺列传》。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④ 参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0 页。

武帝置“五经博士”只是“增置”，而不是“独置”，罢黜“传记博士”是在汉成帝时期^①；有学者则认为汉武帝时确实已经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只是由于当时时局的原因还难以完全实现，到了宣、元时期便最终实现而成为不可逆之势^②。时贤的上述说法各有依据，也各有道理。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中肯。其一，结合上述《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的《百官公卿表》与《董仲舒传》等记载来看，我们认为汉武帝不但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且已经开始在政治实践中大力推行着这一政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其二，汉武帝时期没有彻底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是历史的事实。何以如此？一方面，任何一种统治思想的改变，都很难一蹴而就。汉初黄老政治推行了六七十年，它本身存在着一种历史的惯性，不可能因为汉武帝的一项政令而立即销声匿迹，如《史记·汲黯列传》就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名臣汲黯因“学黄老之言”而位列九卿。另一方面，汉武帝在位时的时局非常吃紧，既有与匈奴之间的残酷战争，又有与王国势力的严峻斗争，一味依靠儒术也是很难解决时局问题的，汉武帝重用酷吏、搞盐铁专卖，这些本身就是汉武帝运用法治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即使到了后来重视德政的汉宣帝统治时，依然重视法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③之语，便是他对太子、亦即后来即位的汉元帝的训示，它深刻揭示了汉朝制度的本质所在。此外，从博士

① 参见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的引论和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③ 《汉书》卷九《元帝纪》。